

目 录

杞县掌故

- 杞县十四景的研究利用.....杜宝田 (1)
书院与黉学.....魏润田 (10)

革命风云

-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杞县.....杜宝田 (13)
捻军在杞活动散记.....杜宝田 (15)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杞县大同中学女生...张宛红 (26)
南下大队来水东.....张宝珠 (29)
睢杞战役西线阻击战.....李金轩 (32)

史料选登

- 抗日战争初期的杞县民运干部训练班...张明堂 (36)
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在杞县的活动.....周济然 (39)

回 忆 录

- 国民党河南十二专署特务队起义记
.....朱公德口述 王转运整理 (43)
马桥会议.....段佩文 (49)
难忘的一次战斗.....李树元 (50)

一四三团战史.....孔庆典 (53)

解放战争中的三次战斗.....刘喜堂 (64)

英烈谱

何心榕.....张效刚 (69)

李公然.....郭继成 李继真 (72)

倪祥明血洒老秃山.....盛景辉 (74)

杞县人物

师陀.....张效刚 刘玉亮 (78)

韩达生.....张鹤峰 (82)

反动人物

李卫国.....梁耀德 (86)

革命纪念地

革命纪念地—何氏宗祠.....秦裕甫 (88)

水东烈士陵园.....孙继书 (89)

文物胜迹

杞县孔庙今昔.....秦裕甫 (92)

杞县城隍庙.....朱德丕 (97)

大云寺塔.....石家恒 (104)

“老官陈”陈氏墓祠.....石家恒 (106)

圍城今昔.....张宝珠 (108)

地名考

焦喇诸名考.....党振廷 (111)

地方名产

马集李子.....党振廷 (112)

沙沃绸.....张广耘 (113)

轶闻轶事

杞北“三抗”斗争记.....李树元 (115)

杞县红枪会史事二则.....朱希文 (118)

杂记

杞县一九四三年的蝗灾.....汪来富 (120)

愿为群众解病痛 尽我一技献良方

.....李弘南口述 李启更整理 (122)

柳杨桥.....刘广汉 (125)

史料摘抄

克威县政府布告.....李树元供稿 (126)

争鸣园地

杞县农民武装起义地址辨.....郭继成 (128)

杞县“十四景”的研究利用

政 协 常 委 杜 宝 田
杞县地方史志总编室副主任

杞县十四景，载于明成化十八年《河南总志》，它从不同角度勾画了当地自然、社会概貌，反映了一代人文风物之盛。标题清晰，文词质朴，迹皆真实，各有特指。其着意落墨处皆在国计民生之要，资政教化之需。今值五百余年之下，犹可发人深思，知所观法。可惜前代人未能对它作出认真研究、利用，而仅仅以此装潢门面，炫耀世人。动辄必称：吾杞，夏禹之后，历史悠久，沃野连阡，物产繁富，人才荟萃，代不乏人，实为繁、冲、要之区，中州之巨县。孰谓不然，请以“十四景”为验。假如今之杞人仍如是对待这一文化遗产，将不仅遭到后人的谴责，且为当代的一大损失。现将我对它初步探讨的情况，分述如下，冀以引起有志振兴杞县的同志的共鸣，续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而阐其奥秘，发其宏旨，作为建设杞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借鉴，以收古为今用之效。

明成化十八年《河南总志》所载杞县十四景，大体可分五类：有关经济、政教者为“内黄牧笛”、“伊庙灵桑”、“圉镇樵歌”、“汴河春渔”、“葛店帘飞”、“杞县钟声”、“芹宫铎韵”7条；自然景观为“黄河晚眺”、“富

岗鹤唳”两条；文物胜迹为“观音胜景”、“禹祠瑞草”两条；乡贤芳躅为“二郦并墓”、“上宋联芳”两条；科技信息则为“神井甘泉”。

其详如下：

一、内黄牧笛。实为当地数百年间盛衰荣枯的总结。今按：内黄，古称外黄，春秋时为宋之黄邑，汉置外黄都尉，唐贞观初并入雍丘（今杞县），明成化时，杞县娄岗、安村二保即其西鄙（清乾隆后改置西肥、新兴、双塔、人和、七基等社）。其地开发甚早，禹治洪水，筑有肥阳城，其后睢水横穿，巴河纵贯，白阳陂（古肥泽）蓄水灌田，成为粮米之乡。宋、元而后，睢水枯竭，白阳淤废，黄河屡夺巴水，地为碱沙，荒瘠不毛。幸赖林牧业代农而兴，遂以“内黄牧笛”闻名于世。当其时，天苍野茫，风吹草低，牛背牧童，短笛信口，仍不失为一派丰乐景象。明季以后，天灾人祸频仍，林牧毁废，延及清末，已成荒凉世界。据民国八年杞县志采访员七基社刘维恒亲历：“见夫沙荒不毛，土岗叠出，固属石田之弃；其无岗者，则沙草满目，四望无涯，间有一二杨柳枝叶，又实毫无生机”。“考庄之东……（岗丘）连绵数里，东西宽数百步。高者数丈，低者数尺，行人至此，为之却步。狂风卷起，飞土虽不足葬身，流沙实可没胫。且夫，风旋为涡，势若仰盂，若至其中，四无所见，高低冥迷，不知西东，采访至此，无不胆颤而心惊也”，巴河社的情况则是：“两水（黄泛故道）所经，占全社十之六七，（水）去尽成沙丘，高低起伏……夏遇大雨，尽成泽国，冬春遇风，尘沙飞沙”。娄岗人苏尔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举人）直叹为：“巴河古渡掩平沙，一望苍茫未有涯……陵谷变迁无

定迹，临风回忆漫长嗟”。当地人民，面对现实，深刻体会到林牧盛衰与当地之荣枯密切攸关，遂又徐图恢复发展林牧，民国初年已初见成效。新兴社采访员××以其数十年的亲身体会证实了发展林牧是当地的正确出路。他在采访录上记下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文章：“杞之新兴，僻处东北……土地瘠薄，人民甚苦。在清光绪年间……（群众）室如悬磬，野无青草……民国以来，庄户地（宅基）犹种蔬菜、百合，沙漠之田，多栽林木、花生，野无弃地，民有余财，颇有家给人足之势……近二三年来，初等小学之外，又有私塾二十余处，一时文风亦蒸蒸日上矣”。其后，杞人田友望在此一带造林一万八千余亩，规模颇大，获利甚厚。建国后，扩建为雕杞林场，今已林带成网，花果溢香，西营等村，因林兴牧，现牧业已占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且有渐进之势，“内黄牧笛”又为当地人民演奏出丰乐之曲。这一胜景，在建国后一度引起当地注意，1958年曾将这一带划为林牧特区，但不久即在“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红芋为王，退林还粮”的浪潮中消声匿迹，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教训。

二、伊庙灵桑。人物风光融为一体，具有双重意义。今按：伊尹、杞之空桑人。今杞县西空桑，旧称伊尹村，即伊尹生地。他相汤伐夏，功勋昭著，作为乡贤，自应崇祀，“（其庙）建于商周之时……虽时变不一，而庙貌如故”（御史任仪《重修伊尹庙碑记》），馨香千秋，大可激励后人；而空桑南北，桑林连绵数十里，尤极一时之壮观。据《杞乘·田赋》：自洪武以来，起科官桑、民桑即达371305株。年征丝12534两，折绢626匹2丈2尺。至万历时，征丝折绢

626匹2丈9尺（内直供京库377匹1丈1尺3寸），又税丝538匹8尺5寸。“农民盖藏之余，家勤蚕织……圉（镇）之绌、沙窝之绸，差堪适用，为世所珍”（清康熙三十二年《杞县志》方产）。据谈：沙窝绸、初著粗厚如棉布，久之则光滑细软，且又有两种特异功能：以之裹尸，虽盛夏可保七日不坏；战士著之，可无卸甲受风之虞。至如围绌，颇类鲁縠，薄如纸，光而洁，轻如无物，确实无愧于名产之称。

“灵桑”万株大可发人深省。

三、圉镇樵歌。圉镇、在今杞县城西南50里，春秋陈地，郑取之，苦楚之难，修干戈于境，以御其患，故曰“圉”。或曰：边陲之号，郑之边邑之谓，又称养马之地，馆驿所在，“（鲁）昭（公）五年，韩宣子如楚逆女，返，郑伯劳诸圉”，即此地。汉至唐初（前206——公元626年）的832年中，三度为圉县、圉城县治所约563年（其间废置约269年）。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改称圉镇至今。地广土肥，昔有林薪之盛。旧志虽略其详，但“樵歌”却已名世。今其“北大坡”号称“杞南粮仓”，固不必退粮还林，然“农桐”、“农果”间作，则为可行之宜，似此，则林茂粮丰，较之昔日“樵歌”，更胜一筹。

四、汴河春渔。汴河古称汴水，《水经》：“汴水东经雍丘故城北”，今杞县城北之惠济河（俗称沙河）即汴水经杞故道。源出大河，水淡宜鱼，当年堤柳如带，鱼跃春汛，渔艇泛于中流，网罟乘时而张，其景可乐，其利无穷。而今水尽污染，生物绝灭，我们在望河兴叹之际，还应更思补救之策。

五、葛店帘飞。所指为葛岗市肆之盛。葛岗，为明代杞

县八铺之一。成化《河南通志》：“铺传八……县西二：曰花园、葛岗，相去各十里”。葛岗铺在县城西二十里，杞县西鄙，开封至商丘驿道所经，商业称盛。清代至今，历为社、区、乡驻地，夙称杞西重镇。今葛岗乡政府已对该村着手改建，中辟公路，街心花园，两侧党、政、企、事机关及工商户铺，楼房连幢，肆开百业，较之当年茅店白屋，板门酒帘，壮观何啻千百。葛岗可以有为，则全县各大村镇似皆可从“帘飞”上去做一番文章。

六、杞县钟声。指为杞县钟鼓楼，即今县政府大门。它在元、明、清三代直至建国前的六百多年间（公元1344年——1945年），计时、报警，对县城人民的兴作起居、治安保卫作出过重大贡献。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知县孙栢栋以楮币五万缗购买县民史某“岑楼”一座。置为“谯楼”，“遂仍其楼，洞辟轩闼，重楫阑楯，加以丹雘之饰，徙鼓角于其上，树横钟于其侧，置壶箭，谨筹刻于其中，楣其额曰‘齐政’。晨瞻夕闻，鬼眼倾耳，杞人之视听为之一新”（《杞县志·谯楼记》）。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知县朱尚文加以扩修，重楼其上，名曰“抚辰”，基高二丈，设置略同元代。再后，历明、清、民国，多次修葺。增设火炮，中午必鸣，称为“午炮”，以正日时；入夜必鸣，称为“定更炮”，以禁宵行；火警必鸣，按东三、西四、南五、北六连鸣，指示肇事方向，督众赴救。遇战乱，则升楼了望，可周察四方二十里敌情。今其楼虽修葺一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钟声久寂，只不过任人凭吊，欣赏其建筑艺术而已。

七、芹宫铎韵。指为县城孔庙。亦称文庙、黉学、黉宫

芹宫、儒学。位于鼓楼之西。明前所建毁于水。明洪武三年（1370年）县丞姚敏重建。成化五年（1469年）改作。规模恢宏，与县衙、城隍庙并称县城三大建筑。改作后计有棂星门、戟门、左学门、大成殿、东西庑廊、明伦堂、志道斋、据德斋、会饬堂等42间，附有文昌祠、奎星祠、神厨、正气坊、尊经阁，泮池、学仓、射圃等建筑。后又有五状元祠、名宦祠、乡贤祠等建筑。明、清及民国初，每年春、秋二八月上丁及孔子诞辰，在此举行祭孔典礼。凡儒童考中秀才，例得入庙环行泮池，称为“游泮”，以示显荣。故历代以为文化教育昌盛之象征。今天我们研究这一胜景，绝无尊孔复古之意，但确实应当从“铎韵”声中悚然兴起，为振兴杞县教育事业下一番切切实实的功夫。

八、黄河晚眺。据旧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南徙，分为二流，入淮之道经杞。其经行之道，据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时情况：自常营入境，下行经高阳、苏木、邢口、郭家庄……至柘境合涡河。此条所记即为高阳一带情景。傍晚临河凭眺，夕晖金波明，长河落日圆的奇观，与那夹岸杨柳、遍野桑麻，帆影天际、舟泛中流，鸦鸣林外，雁落沙头，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都给杞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记忆。明嘉靖二十六年，黄河北移，迁出杞境。这一胜景，已不可再见。但今之铁底河经高阳一段水道，即为昔日黄河遗迹。它虽不以景名世，但它却以灌田、排涝两重功能造福杞人。

九、富岗鹤唳。富岗，在县城西郊。宋名谷林山，清称西岗。雅称新高山，俗称高高山。其实为一土丘，高数仞，方圆数百亩，昔有青松朱樱，为邑人春游之所。宋杨侃《皇畿赋》

曾志其盛：“城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当妍丽，俗重登临，移市竟日，倾城赏心”，这一优美的去处，竟致引人倾城出动，流连终日，乐不思归。现其地已被工厂、住宅占用，县城数万人民，在劳动工作之余，岁时佳节之际，无可供游赏休憩之地，此为县城规划者当作计议者。

十、观音胜境。即县城西南隅之大佛寺。别称“南寺”、“南大寺”。始建无考，唐建中末（公元785年。旧志误为建元末）毁于兵。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修（明末又毁于火，清顺治十六年河南巡抚贾汉复重修），置僧会司于其内，并罗汉、云岩、释迦、寿圣四寺为一，统称观音寺。殿堂巍峨，斋舍栉比，金身耀光，法相生辉，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高超建筑技艺。也是我们研究宗教的好资料。

十一、禹祠瑞草。即大禹庙。在县城东门里。《水经注》雍丘故城条：“城内有禹祠，昔在（商、周）二代，享祀不辍”，即指此祠。杞为夏禹之后，自商初封杞国，以率禹祀，其后历商、周二代，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年）东迁淳于，在杞立国982年。杞国虽迁，但禹祠不废。三国魏曹植封雍丘王，曾迁祠于箕城（旧志：在县城西北三十里，隋末王世充曾置县于此，地望今阙），后又迎回，直至建国后尚有正殿三间，东娄公庙一幢、单间三层（东娄公、周封杞国始君，原在禹祠配享，明万历时另立庙于祠西南）。这一胜景不仅是杞县悠久历史、华夏文明之象征，更可使后之杞人从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献身精神与治平水土的伟大功业中，悠然而动遐思，焕发斗志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十二、二郈并墓。二郈，即郈食其、郈商兄弟，杞县高

阳人。其墓祠在今高阳村南之土丘上，县志谓之“酈生冢”，俗称“冢子庙”。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邑人苋弘撰有碑记。史载：沛公（即位后称汉高帝）西略地至高阳，酈食其为里监门，入见沛公，长揖不拜，晓陈天下利害，以慢礼贤士相责，片言而折沛公。及为沛公使，下陈留，封广野君。高帝三年，为汉使之齐，凭轼下七十余城。其弟酈商，率部数千人从沛公，诛秦灭项，屡建奇勋，积功封右丞相，位列侯。后又封大将军、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户。卒，谥景侯。酈氏兄弟均以事功显世，杞人尊为乡贤，于高阳建祠墓祭享，并入祀乡贤祠。

十三、上宋联芳，此指宋庠、宋祁兄弟并魁故事。二宋祖籍湖北安陆，后徙雍丘（今杞县）居城北六十里双塔村。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兄弟同应京试，礼部举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弟先于兄，改擢庠第一，置祁第十。后人遂以一科两状元传为千秋佳话。庠，初名郊，后改庠，字公序，累掌中枢大政，封郑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赠太尉兼侍中，谥文献。祁字子京，累官翰林院学士承旨。民国八年杞县修志时，其故里仍有龙牌二座，一为“宋赠太尉兼侍中郑国公甲子科（天圣二年）状元宋公讳庠之位”，一为“宋翰林院学士承旨甲子科状元宋公讳祁之位”。二宋事功、文章、详载国史及地方志乘，杞人尊为乡贤，入祀乡贤祠。

二酈、二宋，文韬武略，功业文章，先后辉映史册，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将激励杞人奋发前进。此二景之意义，固不仅青青一冢，巍巍双塔供后人凭吊而已。

十四、神井甘泉。据旧县志：“神井在城中，能兴云

雾，遇旱祷之辄灵”。其详失考。今据民国八年杞县志采访员黄廷彦所见县城观音寺后门一井之状况，可能即为神井。黄记为：“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下午三句钟（十五点）井出浓烟，直冲霄汉……余从井口观之，黑烟迷目，咫尺无所见。至七句钟（十九点）烟出益少，又观之，则烟水迷离而已”。可惜当时限于科技条件，对这一现象，只能解释为：“井底有蟾，能烧成琉璃井百年不坏”罢了。若移至今日，那将是大有可研究的。

总之，明成化总志所载杞县十四景，提要勾玄，展示杞县一代的宏业壮观，或述其山川胜迹，珍奇特异，人文蔚盛，物产繁博；或寓教于景，托古讽今，虽文只点睛而全龙跃然纸上，使后之读者据此已可知一方之精萃。我诚恳希望有志振兴杞县的同志，进而探本索源，发其奥秘，引为资政之鉴。那么，我这篇小文就作为引玉之砖吧。

书 院 与 黉 学

离休教师 魏润田

书院与黉学和夏、商、周时的庠、序、校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课士育才”之所。通过这种教育，统治者培养了一批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人员，受教育者也因此而取得一种异于平民的特殊身份作为进身之阶。所以，书院与黉学既是当时统治者的要务，也是当时读书人藉以腾达的途径。

现以清代为例，把杞县书院与黉学的办理情况简述如下：

杞县书院，原在玉泉街，年久失修废毁，乃改迁大西门街北。后又辟为驿馆，地址狭窄，且送往迎来，喧闹不宁，严重地影响学生学习。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县周玘捐俸倡修，另迁新址（今书院街路北）。因杞县为古之杞国，东娄公为始封之君，遂命名为“东娄书院”。

书院学生正额20名左右。凡具有童生、监生、秀才资格的都可报名应试，择优录取。成绩优异正式录取者为“正课生”，每月发给“膏火银”（灯油费）二至三两；限额外被录取的叫“附课生”，发银减半。授课内容为“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学作“八股文”，五言八韵诗。每月初二、十六，或初五、二十日两课，一次为“官课”，由府、县官轮流出题，阅卷，评发奖金；

一次为“师课”，由书院老师出题阅卷，评发奖金，成绩优秀者奖银一两或二两。家境贫寒的学生也就可把奖金弥补家用。学生在院还要学作“时文”，准备应科举考试。

书院负责人称“山长”，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曾任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就是清光绪年间杞县东娄书院的山长。最后一任山长叫蒋祖仁，山东济宁州有名的举人，长于文学且精通算学，他的学生刘鉴堂由廪生中举，刘玉甫由廪生中拔贡，刘钦堂、赵聘卿由秀才补廪。其他还有不少人中了秀才。

杞县黉学在旧县衙（今县政府）西（现文化局院），明洪武三年创修，也叫县学。它的办学宗旨完全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而定。可以从“卧碑”（原在明伦堂右，今移大成殿右）、《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中体现出来。要求在学生员按照封建伦理行事，做到忠君、孝亲、尊师、重道，不准干预政事和谈论国政。以上训谕由教官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宣讲，发现有违犯者，令其跪在“卧碑”前读碑文。重者还要办罪。

黉学负责人叫“教谕”、“训导”，统称学官。按清朝官阶，教谕一般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严格管教生员并按季考试功课及管理学内的其他事务。

学生未入学前叫“童生”，考入黉学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童生入黉学乃是进身之始，须经考试入学。考时，考生须具有邻里保结，优廪生保结，证明没有受过刑罚，不是居丧，不是外县籍，不是优、娼、隶、卒家子弟，方准应试。考试程序是先应县考，录取后由杞县礼科造名册送开封府，再应府考。府考录取后，开封府再造名册送河南

学政，最后在学院考试，录取后始准进入黉学，称“进学”。考试内容为《四书》、五言诗和默写《圣谕广训》等。发现有代替考试的，代替人与本人都要充军三月。考取人数，杞县规定是三年二十名。初进黉学称为附生，也叫“秀才”或邑庠生员。入学后，再经考试，成绩优等的称“廪生”，数额为20名，可享受廪米银，或免除丁粮。成绩次佳的叫“增广生”，数额也是20名，不享受廪米银。

生员在学中的考试，分岁考与科考两种。岁考每年举行一次，科考隔年举行一次，由省学政主持。岁考内容为书艺二道、经艺一道，如在冬季举行考试，减试书艺一道。岁考试卷列入优等者可升等，如附生可补为增广生，增广生可补为廪膳生；列入劣等的则依次递降。最优的或已为县学廪膳生年岁最久的，经过考试可升为贡生或优贡生、拔贡生。

生员在黉学学习的课程，全是国家规定的：有《御纂经解》、《四书》、《性理大全》及古诗文、《资治通鉴》、《历代名臣奏议》、《圣谕广训》等。至如一家之言、“淫词琐语”概不准阅读。清初，凡生员必须到黉学读书。雍正以后，生员家离黉学远者，允许按规定日期到学听教官讲解、训导，其它时间，可以在家自学规定的课程，按季、按月到黉学参加月考、季考、岁考。这样以来，入黉学读书就流于形式，黉学也成了单纯办理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了。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杞县

政协常委 杜宝田

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一日（农历，下同），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亮率领下，由扬州出师北伐，途出河南，由归德西进，一度驻扎杞县。他以强大的军威、良好的军纪，给杞县人民留下了长久的赞誉与怀念。

据民国八年《杞县志稿》记载，这支部队自杞县分两路向开封进发。南路于“咸丰三年五月十一日‘发匪’到县城。武营官（城守营千总）胡韶武闻‘贼’至护城堤，即骑马逃回汴城矣。县主谢葵闻‘贼’至鼓楼，即跳墙入民宅内，避匿二、三日逃回省城（另据晁村社采访员张开来记，邑侯谢公，避难于邸从石口（今称青龙石口村）武举张文士宅，武举之子振山约三十六社首事人等进省，稟明谢公受伤之处，始免罪。并未逃省城）；前学官（县学教谕）左鹏程、后学官（县学训导）杨月桂、典史官余长清皆逃城外居住。‘发匪’规矩甚好，凡有妇女者，即下令不准擅入宅内。至十二日即自杞城西去”（刘维恒采访）。又：“（北伐军）北上河南，由归德经往汴城，路经杞县。当时，杞城恶劣，一闯而进……官道南北，秋毫无犯”（李福熙采访）。

北路军经杞县阳堙（城北35里）、焦喇（城北40里）、

白丘（城西北35里）、于寨（城西北25里）等地，他们杀掉了袭击部队的阳堙社史马房村的史廷栋（附生）、史毓林（地主）及葛岗社于寨村的于祖培（秀才），而当“经过焦喇社（时），绝不扰害人民。人民安堵无恐”（侯世珂采访）；对每家仅留一二人守家，毫无防御能力的白丘寨，只是从寨外行军，未曾进寨。

从以上几则片断记载，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杞县，只是严惩了个别反动的顽固分子，绝对没有扰害群众的行为。尽管那些反动统治者对太平天国军恨之入骨，骂贼、骂匪，不绝于口，又编造了一些烧杀抢掠的鬼话，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既不得不承认这支部队的良好军纪，也无法掩盖那些反动头目闻风丧胆、狼狈逃窜的丑态。